

〈附論〉六朝穀倉罐綜述

筆者過去曾撰文考察三國兩晉時期，以越窯青瓷為主的陶瓷器上所見的佛像裝飾，¹於該文中約略涉及六朝時期所謂穀倉罐的分布、時代、佛像裝飾、用途和產地等等。由於穀倉罐上經常可見的佛像裝飾是探討中國早期佛像及其有關問題的極為重要的參考資料，而近數年來亦陸續得見不少與此相關的考古發掘報導和研究論述，這些新的資料或研究論點有的可補足、修正筆者當時所做的推測，有的則與筆者的理解相距甚大，覺得有必要提出討論。因此本文擬依據目前所能見到的穀倉罐，結合先學的研究業績，以近似補遺的形式再次談談有關穀倉罐的幾個問題。

歷來的研究者對於三國西晉時期經常裝飾有人物、飛鳥、百獸、樓閣等題材的本文所謂穀倉罐的名稱，迄今未取得一致的見解。有的根據其主要裝飾題材稱它為「堆塑人物樓閣罐」、「飛鳥人物罐」、「五壺罇」；也有的推測其可能的用途或象徵意義叫它做「神亭」、「魂瓶」、「魂亭」、「骨灰罇」、「宇宙壘」、「穀倉罐」，或逕呼為「堆塑罐」、「飾壺」以及「陶壘」等。上述種種稱呼，各有偏重，有的還明顯與事實不符，不過在還未有更恰當的命名出現之前，本文仍暫且沿用「穀倉罐」這一稱呼，其理由或作品本身的可能用途將於下文敘及。

一、出土分布和流行時代

相信絕大多數的研究者都能同意裝飾繁縟的六朝時期穀倉罐，極有可能是由東漢時期於五聯罐上加飾簡單貼塑的作品發展而來的。如浙江奉化東漢熹平四年（175年）墓，²或同省武義縣漢墓出土的於罐身貼塑人物或鳥獸的青瓷五聯罐，³可能即為六朝穀倉罐的前身。相對於漢代五聯堆塑罐均集中出土於浙江省，六朝穀倉罐的分布則有了進一步的擴展。就筆者所能掌握到的國內外公私收藏的近一三〇件穀倉罐資料，至少有九十餘件作品可確認其出土地點。出土分佈明顯地集中於江蘇和浙江省，前者出土四十餘件，後者也出土了三十餘件，其次安徽省蕪湖地區也有少量出土，個別出

1 謝明良，〈三國兩晉時期越窯青瓷所見的佛像裝飾〉，《故宮學術季刊》3卷1期（1985），頁35-68。

2 奉化縣文管會（王利華）、寧波市文管會（林士民），〈奉化白杜漢熹平四年墓清理簡報〉，《浙江文物考古所學刊》創刊號（1981），頁210。

3 武義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從浙江省武義縣墓葬出土物談婺州窯早期青瓷〉，《文物》1981年2期，頁51。

土例還可見於福建東北部鄰近浙江省的霞浦縣和江西西北部的瑞昌縣（附圖一）。

就紀年穀倉罐（包括紀年墓出土作品和穀倉罐本身就刻有紀年銘文者）的年代而言，最早的實例見於浙江嵊縣大塘嶺吳太平二年（257年）墓；⁴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紹興出土的吳永安三年（260年）刻銘作品，⁵亦是著名的早期紀年遺物（圖1）。最晚的作品則曾見於浙江蕭山縣東晉永昌元年（322年）墓，⁶不過由於該作品的造型和裝飾作風均與前述吳永安三年銘作品頗為類似（圖2），因此有的研究者仍將其年代定於東吳時期。⁷鑑於該墓迄今未有正式發掘報導，詳情不得而知，不過若從樣式上比較目前已知的其他紀年穀倉罐，筆者也同意這個看法。這樣看來，就經正式考古發掘報導的紀年穀倉罐而言，其最晚的實例恐怕要屬紹興縣上蔣鄉西晉永嘉七年（313年）墓所出作品（圖19）。

8

其次，除了前述東晉永昌紀年墓所出作品之外，其餘可確認的三十餘件紀年穀倉罐的所屬時代均在吳至西晉時期，其中並有半數以上作品集中於三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至於其他出土有穀倉罐的非紀年墓之相對年代，亦均屬吳至西晉時期，目前尚未見東晉墓出土穀倉罐的正式發掘報導。儘管如此，如果我們考慮到若干四世紀初西晉晚期紀年墓亦曾出土穀倉罐，因此若說穀倉罐遲至東晉早期仍有少量生產也不是不可能的事。這自然還有待今後新資料的出土，以及從樣式上著手，針對穀倉罐的變遷進行細密的編年分期，從而確認晚期作品的造型和裝飾特徵等基礎作業來解決。然而目前可斷言的是，穀倉罐無疑流行於三國後期至西晉時期。

二、分類的討論

有關穀倉罐的分類討論，近年先後已由長谷川道隆和岡內三真兩人撰文進行考察。長谷川氏認為穀倉罐可區分為四類：（1）上部裝飾多層亭臺樓閣者；（2）於罐的盤口以下置樓閣或人物、鳥獸等裝飾者；（3）以盤口為臺，臺上下加飾堆塑，並於上方置帶牆樓宇；（4）盤口上置四合院式院落形蓋等四類。⁹就同氏所分類的各類作品結合報告書所記或筆者所推測的相對年代而言，第一類的時代包括吳及西晉，而以西晉作品居多；第二類作品當中除瑞昌馬頭墓可能屬吳至西晉早期，其餘均為東吳作品；第三類亦涵括東吳至西晉作品；第四類則均屬西晉時期作品。因此，長谷川氏的分類雖有助於其自身行文討論的方便，然而既看不出其分類或編年的真正用意，對於部分可能介於各型之間不易區分或其他造型的作品似亦只能略而不談。

4 嵊縣文管會（張恒），〈浙江嵊縣大塘嶺東吳墓〉，《考古》1991年3期，頁206-215。

5 陳萬里，《中國青瓷史略》（香港：中華書局，1976），圖1。

6 朱伯謙，《越窯》中國陶瓷全集4（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美乃美，1981），圖版96。

7 同上註。

8 沈作霖，〈浙江紹興鳳凰山西晉永嘉七年墓〉，《文物》1991年6期，頁59圖2。

9 長谷川道隆，〈吳、晉（西晉）墓出土の神亭壺——系譜および類型を中心に〉，《考古學雜誌》71-3（1986），頁325-342。

另一方面，岡內三真氏則將所謂的穀倉罐區分為六式。¹⁰由於同氏除了對穀倉罐本身造型和裝飾進行檢討，並且結合紀年遺物以及其他與穀倉罐伴隨出土的陶瓷，詳細論證了各式之間的演變序列，資料較為齊全，因而乍看之下似具有相當的說服力，並為其他研究者屢次徵引。然而若對同氏分類的各式作品之所屬年代細加檢討，則不難發現其編年觀極為可疑，特別是V和VI式罐的所屬年代及其區分標準頗有商榷餘地。歸納岡內氏所設定的各式作品的主要特徵是：I式，於大型壺周邊圍繞四小壺，壺身飾少量人獸貼塑者；II式，小壺趨小，頸部的建築物增加形成多層建築，左右設門闕、鳥獸、人物增多並具象化，並開始於頸和器身腹設一牆壁狀突帶。III式，罐上置獨幢屋頂蓋，屋頂飾立鳥，四小壺不甚醒目。IV式，從外觀上不能輕易看到罐口或四小壺，亦有以小亭代替小壺者，配置有四合院式大形建築物蓋。V式，罐上置獨幢小屋，頸部小壺亦不甚明顯，建築物周圍多為拱手跪座人物像，整體裝飾較儉樸。VI式，大形壺上置獨幢屋，以佛像為主要裝飾題材，少見人物像，罐身貼飾多已消失。

就岡內氏的整體型式分類看來，似乎還存在若干有待商榷、很難以同氏的分類條件予以區分的作品。如同氏將之歸入V式的上海博物館藏作品即與III式江寧上坊吳天冊元年（275年）墓（圖15）¹¹或南京西崗西晉墓¹²作品大體相似。而浙江金華古方二十五號西晉墓¹³V式作品也與紹興西晉墓IV式作品不易區分。¹⁴其次，岡內氏的分類亦充斥著許多我們無法明確地判斷到底係時代因素？地域風格？抑或僅僅是匠人興之所至，隨手拈來的相異裝飾題材？而這些不同的細部裝飾則成了同氏若干類型區分的主要條件之一。如多數的V式作品似即因罐上屋宇上未飾展翅欲飛的鳥而被與III式區分為不同型式；而吳縣獅子山一號墓西晉元康五年（295年）之VI式作品（圖16）¹⁵雖與南京板橋鎮西晉永寧二年（302年）墓¹⁶同氏所歸類的V式作品整體作風頗為類似，然而卻因佛像裝飾的有無而分別歸入兩種不同的類型。姑且不論岡內氏的分類是否可行，我們似可結合考古發掘遺物做進一步的檢驗，進而嘗試梳理出穀倉罐可能的造型、裝飾變遷。

三、造型和裝飾變遷——兼與岡內氏商榷

岡內氏所分類的六式穀倉罐中，除I式時代較早，包括東漢時期作品故不予討論之外，以下擬

10 岡內三真，〈五連罐と裝飾付壺〉，《古代探叢I——早稻田大學考古學會創立三十五周年紀念考古論集》（1985），頁669-706。

11 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南京郊縣四座吳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8（1983），圖版壺1、2。

12 南波，〈南京西崗西晉墓〉，《文物》1976年3期，頁58圖9。

13 金華地區文管會（貢昌），〈浙江金華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年9期，圖版陸之5、6。

14 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10，（東京：小學館，1982），頁225圖218。

15 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江蘇吳縣獅子山西晉墓清理簡報〉，《文物資料叢刊》3（1980），圖版拾伍之1。

16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板橋鎮石閘湖晉墓清理簡報〉，《文物》1965年6期，圖版肆之6。

對同氏所主張穀倉罐係由Ⅱ式向Ⅵ式逐型變遷的編年序列進行檢討。

由於Ⅱ-Ⅳ式作品有不少伴隨出土紀年遺物，或作品本身即帶有紀年銘文，因此可相對輕易地推測目前所見上述各式作品的可能所屬年代。就目前的紀年資料看來，Ⅱ式罐最早見於前述吳永安三年（260年，圖1）¹⁷或太平二年（257年）；¹⁸最晚的屬趙士岡七號吳鳳凰二年（273年）墓所出作品。¹⁹Ⅲ式罐最早見於江寧上坊公社吳天冊元年（275年）墓（圖15）；²⁰晚迄金華古方三十號西晉墓太康二年（281年）墓還可見到。²¹至於Ⅵ式罐，近年來雖於福建霞浦吳天紀七年（277年）墓出土疑似Ⅳ式作品，²²可惜所揭載的圖版不甚清晰，難以遽下斷言。因此若僅就可確認的作品而言，早自紹興西晉太康三年（282年）墓；²³晚迄諸暨西晉元康元年（300年）墓²⁴或紹興西晉永嘉七年（313年）墓（圖19）²⁵仍可見到。儘管我們很難理解岡內氏所區分的Ⅱ-Ⅵ之間均在短短的一、二年間就幾乎全面地完成了新的樣式且付諸生產，目前亦無法全面而明確地判明各式作品的具體窯屬及其可能因產地的不同而存在的相異面貌，不過除了前述霞浦吳紀年墓所出作品尚待證實之外，各式作品的年代確多與岡內氏所主張的Ⅱ式→Ⅲ式→Ⅳ式的編年大體相符，雖然新的資料則表明晚至四世紀二十年的Ⅳ式罐仍然可見。另一方面，就如岡內氏自己亦曾指出，吳縣獅子山一號墓同時出土了Ⅳ式和Ⅵ式作品（圖16）；²⁶而Ⅳ式和Ⅴ式紀年作品中亦出現重疊時期，同氏認為前者係因二次埋葬所造成，後者亦只是說明了相似型式間仍有部分作品同時並存，不足為奇。然而，事實確實是如此嗎？

就岡內氏所指的Ⅴ式罐的時代而言，最早的紀年作品出於杭州西晉太康八年（287年）墓，²⁷最晚的則晚至南京板橋鎮西晉永寧二年（302年）墓。²⁸因此Ⅴ式最早紀年作品的時代不僅是與Ⅳ式重疊，而是屬Ⅳ式的早期且鄰近於Ⅲ式。由於杭州西晉太康八年墓的發掘報告要晚於岡內氏論文的發表，所以筆者無意利用新的出土資料來苛責岡內氏的編年。不過依據岡內氏文中所列舉的八件器形完整的Ⅴ式罐，則紀年作品雖均屬西晉時期，然而卻有部分作品可早到東吳，或吳至西晉時期。如南京鄧府山一號墓（圖9）²⁹的時代，於發掘報告書中雖未明確涉及，既稱「早可至孫權時，遲可至

17 陳萬里，同註5，圖1。彩圖可參見，座右寶刊行會，同註14，頁99圖89。

18 嵎縣文管會（張恆），同註4，頁209-210。

19 王志敏，〈從七個紀年墓葬漫談——1955年南京附近出土的孫吳兩晉青瓷器〉，《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11期，圖見《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11期，封底內頁。

20 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同註11，頁9-11，圖版壹1、2。

21 金華地區文管會（賈昌），同註13，圖版陸之5、6。

22 黃亦劍，〈福建霞浦發現三國農具模型〉，《農業考古》1990年1期，頁117圖2。

23 張拯元，〈紹興出土古物調查記〉，《文瀾學報》3-2（1937），圖4。圖轉引自岡內氏，頁678第3圖之24。

24 朱伯謙，〈文物工作報導——浙江省諸暨蠶桑學校工地清理晉墓兩座〉，《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12期，頁76，圖見封底內頁「瓷穀倉罐」。

25 沈作霖，同註8，頁59圖2。

26 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同註15，圖版拾伍之1。

27 葉玉奇，〈江蘇吳縣何山出土晉代瓷器〉，《東南文化》1989年2期，圖版四之1。

28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同註16，圖版肆之6。

29 南京博物院，〈鄧府山古殘墓清理記〉，《南京附近考古報告》5（1952），圖版伍之1-4。

東晉初年」，又說可能為「漢末或六朝初」。不過同墓出土的青瓷蛙盃既與鎮江高淳金山下一號吳墓所出者造型一致；³⁰其青瓷盤口壺也與趙士岡吳赤烏十四年（251年）墓作品相近。³¹其次，鄧府山一號墓的屋形雞舍曾見於鎮江高淳化肥廠一號吳墓；³²帶四阿頂廁的陶豬圈也與推測屬東吳時期的建寧磚瓦廠墓所出同類作品近似。³³若結合該墓屬帶小耳室短甬道構築，具長江下游吳墓流行樣式之一，則鄧府山一號墓的時代應為東吳無疑。此外，鄧府山一號墓出土的紅陶穀倉罐的造型、裝飾作風，亦多與早年傳上虞龍山出土品頗為類似，³⁴其時代也應相近。後者龍山所出作品，曾由羅振玉將其定名為「吳會稽陶壺」，看來羅氏當是有所依據的。因此，岡內氏將上述兩件穀倉罐均歸入V式，認為其時代要晚於II-IV式的編年，恐與事實不符。

此外，岡內氏依據南京高家山二號墓伴隨出土的青瓷灶³⁵灶門開至底部的特徵，主張其時代應較晚，從而認為同墓出土的V式穀倉罐時代要晚於II-IV式的看法亦值得商榷。就目前的資料看來，灶門開至底部於前述南京鄧府山一號墓或中華門外板橋墓、³⁶西善橋建寧磚廠墓，³⁷以及鎮江句容陸家院等吳墓中均可見到。³⁸因此，雖說西晉中期之後，以灶門開至底部的作品佔絕大多數，然而我們卻看不出其與時代之間的必然關係。事實上，就高家山二號墓青瓷灶的整體造型而言，其既與同省溧陽縣吳鳳凰元年（272年），³⁹江寧縣天冊元年（275年），⁴⁰金壇縣天璽元年（276年）⁴¹等東吳紀年墓相近，亦與句容元康四年（294年）等西晉墓相近。⁴²其次，同墓所出鏤孔薰罐造型既與吳天璽元年（276年）墓作品相近，⁴³也與獅子山一號西晉元康五年（295年）墓作品類似。⁴⁴至於其青瓷鏹斗盆則又與前述句容西晉元康四年墓所出作品造型大體一致。⁴⁵因此，就高家山二號墓伴隨出土的陶瓷時代而言，我們雖難確認其具體的時代上限，但幾乎可以肯定其必為四世紀以前作品，亦即介於岡內氏所區分的IV式至V式的編年之間。若結合前述杭州西晉太康八年（278年）墓亦見V式穀倉罐，那麼顯而易見的，V式罐並非均晚於IV式罐一事，恐怕就不是用相近型式有部分作品重疊並存

30 鎮江博物館（劉建國），〈鎮江東吳西晉墓〉，《考古》1984年6期，頁531圖5之4，圖版柒之6。

31 王志敏，同註19，頁11圖1。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南京出土六朝青瓷》（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圖17。

32 鎮江博物館（劉建國），同註30，頁530圖四之9，頁533圖6。

33 胡繼高，〈記南京西善橋六朝墓的清理〉，《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12期，圖6。

34 羅振玉，《古明器圖錄》卷二（倉聖明智大學刊本，1927），以及《羅雪堂先生全集》（臺北：文華出版公司），續編六，頁2483；續編十三，頁5312。

35 李蔚然，〈南京高家山的六朝墓〉，《考古》1963年2期，圖版玖之2。

36 李蔚然，〈南京南郊六朝墓葬清理〉，《考古》1963年6期，圖版捌之4。

37 胡繼高，同註33，圖7。

38 鎮江博物館（劉建國），同註30，頁533圖七之2。

39 南京博物院（汪遵國），〈江蘇溧陽孫吳鳳凰元年墓〉，《考古》1962年8期，頁413圖3。

40 南京博物館（易家勝），同註11，圖版貳之13。

41 鎮江市博物館、金壇縣文化館（劉興、蕭夢龍），〈江蘇金壇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6期，頁60圖1。

42 南波，〈江蘇句容西晉元康四年墓〉，《考古》1976年6期，圖版拾貳之5。

43 鎮江市博物館、金壇縣文化館（劉興、蕭夢龍），同註41，頁60圖2。

44 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同註15，頁138圖15。

45 南波，同註42，頁397圖5之4。

的解釋可以自圓其說的。

岡內氏所列舉的VI式罐計六件，其中僅吳縣獅子山一號墓伴隨出土西晉元康五年（295年）紀年磚，⁴⁶其餘均屬非紀年作品。獅子山一號墓共出土兩件穀倉罐，其分別相當於岡內氏所區分的IV式和VI式，同氏並聲稱該墓伴隨出土的紀年磚應是與IV式罐同為第一次埋葬品，至於同墓出土的VI式罐則應為二次埋葬時的追葬品。然而依據報告書所記，獅子山一號墓保存完好，未經盜掘或擾亂，因此岡內氏的上述推測除了有助於其自身穀倉罐編年論的圓滿達成，筆者實在看不出其是否有任何實物依據？退一步說，姑且不論獅子山一號墓共出的IV式和VI式罐是否可能係二次埋葬所造成，其餘五件非紀年的VI式罐中，除了南京郎家山墓⁴⁷和日本私人藏品⁴⁸等兩件作品無出土發掘報告之外，有三件墓葬出土作品已經正式報導，這就提供探討其相對年代的重要線索。

三座出土VI式罐的非紀年墓分別是南京甘家巷高場一號墓（圖8）、⁴⁹江寧縣殷巷公社一號墓⁵⁰和浙江武義縣竹園墓。⁵¹儘管上述三座墓葬的時代於原發掘報告書中均將之比定為東吳時期，不過岡內氏則經由對殷巷公社和武義竹園墓伴隨出土的其他青瓷之編年，主張其均要晚於II-V式的所屬時代，即約相當於西晉晚期至東晉初期；而這一看法恐亦與事實不盡相符。就殷巷一號墓和高場一號墓所出陶瓷組合而言，前者雖經盜掘但仍出土了二十二件陶器另八件青瓷；後者除出土兩件青瓷外，出土的陶器或釉陶則有二十餘件，兩墓陶器數量均高出青瓷甚多，陶器種類包括灶、碓、箕、磨、篩、禽舍等明器模型和動物俑，具有江蘇吳墓出土陶瓷組合特徵，其與西晉墓一般以青瓷器皿居多，少見陶明器模型的組合特徵有所不同。⁵²

就出土的陶瓷器形而言，殷巷一號墓的青瓷唾壺、折沿洗均與同省高淳金山下或高淳化肥廠吳墓所出作品造型相近；⁵³青瓷虎子則與浙江嵊縣西晉元康八年（289年）墓作品一致；而其陶水盂又與前引中華門外板橋鎮吳墓作品大體相同。⁵⁴至於武義竹園墓所出陶瓷，除青瓷雞舍造型與南京板橋鎮西晉永寧二年（302年）墓作品相近；⁵⁵井式罐與獅子山一號西晉元康五年（295年）墓作品一致之外，⁵⁶其餘作品造型均與江浙地區吳墓所出陶瓷頗為相似。如雙繫罐與浙江衢州吳墓作品；⁵⁷盤口

46 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同註15，頁130。

47 史岩編，《中國形塑史圖錄》2（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頁494圖583。

48 小山富士夫，《青磁》陶磁大系36（東京：平凡社，1978），彩圖1。

49 金琦，〈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考古》1963年6期，圖版參之2。

50 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同註11，圖版壺之4。

51 金華地區文管會、武義縣文管會（貢昌），〈浙江武義陶器廠三國墓〉，《考古》1981年4期，圖5左。

52 謝明良，〈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組合特徵及其有關問題〉，《故宮學術季刊》8卷1期（1990），頁96-97。

53 鎮江博物館（劉建國），同註30，頁532圖6之10、圖6之5。

54 嵊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傅冬根），〈浙江嵊縣清理一座西晉殘墓〉，《文物》1987年4期，頁50圖2。李蔚然，同註36，圖版捌之6。

55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同註16，頁45圖16。

56 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同註15，頁138圖13。

57 衢州市文管會（崔成實），〈浙江衢州市三國墓〉，《文物》1984年8期，頁41圖2。

壺與江寧上坊吳天冊元年墓作品；⁵⁸ 鏤空薰與金壇吳天璽元年（276年）墓作品；⁵⁹ 廣口罐與金華古方第十二號⁶⁰ 或鎮江高淳化肥廠一號吳墓所出作品均較為一致。⁶¹ 因此岡內氏針對殷巷一號墓出土的唾壺、折沿洗、虎子、盤口壺，以及武義竹園墓出土的鏤孔薰、廣口罐、井式罐等青瓷作品所做的編年排比，不僅問題重重，並未列舉任何紀年實物依據，其所論述的造型變遷規律似乎也只是憑著自身的想像而隨意進行的。

此外，高家山一號墓出土的青瓷鉢與郎家山西晉元康三年（293年）墓⁶² 或周墓墩西晉元康七年（297年）周處墓所出作品相近；⁶³ 青瓷小盃與南京西晉太康六年（285年）曹翌墓作品一致；⁶⁴ 其帶蓋陶罐不僅見於中華門外板橋公社吳墓，⁶⁵ 也與幕府山吳五鳳元年（254年）一號墓作品有類似之處；⁶⁶ 而吳天冊元年（275年）墓所出陶磨造型更與高場一號墓作品完全一致。⁶⁷ 這樣看來，高場一號墓的時代，雖然未必如過去部分研究者所推測可能為吳赤烏（238-250年）之後那樣早，⁶⁸ 然而肯定不晚於三世紀，結合其出土陶瓷的組合情形等看來，發掘報告書將之定為東吳時期墓葬應是頗為貼切的。因此上述三座出土VI式穀倉罐的非紀年墓之時代，不僅不晚於岡內氏所區分IV式罐的時代，而且還要早於IV式，甚至有可能是六朝穀倉罐的早期樣式之一。不過從近年揚州胥浦西晉元康七年（297年）亦曾出土類似作品看來（圖10），⁶⁹ 該式罐於三世紀末仍持續生產。後者胥浦紀年墓所出穀倉罐罐身瘦長，造型僵化，推測其時代有可能略晚於前述三座非紀年墓作品。

觀察目前所知穀倉罐之造型裝飾特徵及其所屬時代，不難看出造成其不同造型裝飾作風的原因，除了時代差距之外，還存在著地域風格。其次，同一時期或相同地區亦經常同時並行一種以上的裝飾意匠。儘管如此，如果總結目前已知穀倉罐，亦可大致窺知各式穀倉罐的可能相對年代。就這點而言，相對於東漢時期的作品，絕大多數的六朝穀倉罐於外觀上均已明確地區分為上下二層形式，其中上部大罐口沿環置四小罐，並貼飾少量人物、鳥獸或構築簡單屋宇的作品（相當於岡內II式中部分作品），應屬早期樣式之一，時代集中於吳至西晉早期。值得一提的是，該式罐下部罐身多僅穿鑿小孔，孔旁一般飾外觀形似泥鰍或蜥蜴的爬蟲類（圖7）。其次，於大罐口沿貼飾爭食小鳥，盤口下飾亭閣、鳥獸或人物，並置四小罐的作品（相當於岡內II式中部分作品），其時代亦較早，多

58 南京博物館（易家勝），同註11，圖版貳之6。

59 鎮江市博物館、金壇縣文化館（劉興、蕭夢龍），同註41，頁60圖2。

60 金華地區文管會（貢昌），同註21，頁818圖5之2。

61 鎮江博物館（劉建國），同註30，頁532圖6之3。

62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南京出土六朝青瓷》（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頁56圖40。

63 羅宗真，〈江蘇宜興晉墓發掘報告——兼論出土的青瓷器〉，《考古學報》1957年4期，圖版參之1。

64 王志敏，同註19，頁12圖13。

65 李蔚然，同註36，圖版捌之6。

66 南京博物館（易家勝），同註11，頁4圖4之10。

67 南京博物館（易家勝），同註11，頁7圖7之12。

68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170-171。

69 胥浦六朝墓發掘隊（吳煒等），〈揚州胥浦六朝墓〉，《考古學報》1988年2期，圖版貳之2。

屬吳或西晉早期，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新購藏的穀倉罐即屬該一類型（圖 3）。該式作品下部罐身有的貼飾各種魚蟲飛禽走獸或人物、佛像，有的僅飾陰刻動物圖形，除少數作品之外，多數罐身均不鑿孔。其次，上述兩式早期作品均無蓋。

於大罐口沿上置屋形蓋，下方飾樓閣、人物、鳥獸等，圍繞罐上方的四只小壺仍清晰可見的作品（包括岡內Ⅲ式、Ⅴ式、Ⅵ式中部分作品）（如圖 15、16 等），其出現時間可能稍晚於前述二式中的最早作品，不過其延續時代卻較長。就目前的紀年資料看來，其早自南京吳天冊元年（275 年）墓⁷⁰已經出現（圖 15），晚迄南京板橋鎮西晉永寧二年（302 年）墓⁷¹仍可見到。至於於罐口上置大型四合院式蓋，圍繞罐口的四只小壺或於外觀上不能輕易窺見，或已為亭臺取代而消失的作品（相當於岡內Ⅳ式）（如圖 6、13、14 等），除待確認的福建霞浦東吳紀年墓一例之外，多數作品時代亦相對較晚，目前可確認最早紀年作品出於紹興西晉太康三年（282 年）墓⁷²，而晚至紹興西晉永嘉七年（313 年）墓仍可見到（圖 19）。⁷³相對於前述各類作品多屬青瓷，亦可見到陶器或釉陶作品（包括岡內Ⅴ、Ⅵ式中部分作品）。該類作品多出土於南京地區，有的作品如南京或揚州胥浦所出者，上部呈帶蓋二層臺，比例大於下部罐身，並經常飾以尺寸較大、數量較多的佛像，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圖 8）。就目前的資料看來，其較流行於東吳時期，但晚至胥浦西晉元康七年（297 年）⁷⁴墓仍有出土（圖 10）。

無可諱言，筆者上述的粗略劃分並無法涵括目前所見全部作品的造型或裝飾特徵。不過就整體來看，穀倉罐似乎是經歷了從無蓋到有蓋，從裝飾簡樸到裝飾繁縟，環繞大罐口沿或屋宇的四小壺也從清楚易見而逐漸趨小而埋沒於其他裝飾之間，以至終於消失。不過應該留意的是，穀倉罐的變遷並非在縱向單線上逐步進行的，上述各式之間事實上還存在著為時不一的重疊時期。估計隨著今後新的資料的出土，我們將可逐漸清理出其時代作風和地區樣式，並重建各式之間的關係及其發展變遷。無論如何，將岡內氏所主張時代要晚至西晉末、東晉初的經常飾有成列佛像的陶穀倉罐的時代提前到東吳或四世紀前西晉時期，不僅與墓葬所出的其他伴隨遺物時代相符，也與裝飾有佛像的六朝陶瓷之時代，均集中於吳末至西晉中期之間的年代觀相符。

四、產地、用途和名稱

就六朝穀倉罐的材質而言，計有青瓷、黑褐釉、陶器或釉陶器等幾種，而以青瓷佔絕大多數。

70 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同註 11，圖版壹 1、2。

71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同註 16，圖版肆之 6。

72 張拯元，同註 23，圖 4。

73 沈作霖，同註 8，頁 59 圖 2。

74 胥浦六朝墓發掘隊（吳煒等），同註 69，圖版貳貳之 2。

後者青瓷作品，不僅可依其胎質、青釉的呈色以及墓葬伴隨出土的其他陶瓷，比照近年來的盜窯發掘出土作品，大致推測多數作品應來自浙江盜窯所生產，部分作品所飾龜趺碑文更是直接明示了其生產窯屬。如浙江餘姚出土的穀倉罐碑文有「元康四年九月九〔造〕□州會稽」銘文；⁷⁵同省平陽縣出土作品有「元康元年八月二〔造〕會稽上虞」（圖 13）；⁷⁶江蘇吳縣出土的穀倉罐上亦有「元康二年潤月十九日起會稽」或「出始窰，用此……」等碑銘（圖 14），⁷⁷均明白地指出其產地在「會稽上虞」或「始寧」（今浙江省上虞縣南），屬越窯作品。其次，考古發掘資料也表明：上虞縣上浦鄉窯址曾出土西晉時期的穀倉罐。⁷⁸此外婺州窯（浙江中部金華地區）亦有少量生產。如浙江武義廠三國墓或金華古方第十二號三國墓、二十五號西晉墓出土的青釉穀倉罐，其胎釉與婺州窯窯址標本一致，屬婺州窯作品。⁷⁹至於安徽繁昌吳墓所出作品有研究者認為可能是皖南當地所產（圖 7）；⁸⁰而不少江蘇地區的研究者亦主張宜興周墓墩墓出土青瓷可能來自當地均（南）山窯所生產，⁸¹值得注意的是周墓墩二號墓也出土了一件青瓷穀倉罐。⁸²不過就目前所見穀倉罐的胎釉看來，其絕大多數應來自浙江地區窯廠。另一方面，南京或揚州地區出土的陶瓷或黑褐釉穀倉罐，其造型和裝飾特徵則與一般所見浙江盜窯所生產的青瓷作品頗不相同。從該類作品均出土於江蘇境內，其中又以南京地區最為集中等情形推測，有可能為當地窯廠所燒製，而非來自浙江地區。

過去的研究者在敘及穀倉罐的用途時，有的認為是香爐、薰籠之類，有的推測它具有宗教用途，有的認為是祭器，也有的主張是骨灰罈。穀倉罐是否具有宗教或所謂祭器的性質？目前還難遽下斷言。不過六朝的香爐或薰籠已由考古發掘所得眾多遺物而證實，它和穀倉罐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其次，考慮到不少帶蓋穀倉罐，蓋與罐身均黏結燒成一體，不能取下，以及有的墓葬還伴隨出土有骨架或腐朽的棺木遺留，其不應是骨灰罈。筆者同意絕大多數研究者所主張穀倉罐是喪葬用明器的看法。如羅振玉舊藏的作品有被釋讀為「會稽出始窰（寧），用此喪葬，宜子孫作吏高，遷衆無極」銘文；⁸³私人藏品中亦有「寶鼎四年□家喪」碑銘（圖 4）⁸⁴即說明了穀倉罐應是與喪葬有關的器物。不過對於其具體的使用方式或象徵意義，卻直到近年來才有較多的討論或推測。如張勳氏認為穀倉罐上部俯視為一內方外圓類似「明堂」、「辟雍」之禮制建築，亦即理想化的天堂中建築；⁸⁵李剛氏推測穀倉罐中間大罐象徵佛塔，環繞的四小罐表東西南北四方的天，上部建築則為佛寺建築模型。⁸⁶

75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同註 68，頁 161。

76 徐定水、金柏東，〈浙江平陽發現一座晉墓〉，《考古》1988 年 10 期，圖版柒之 5。

77 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同註 15，圖版拾伍之 2。

78 阮榮春、木田知生整理，〈“早期佛教造像南傳系統”調查資料〉，《東南文化》1991 年 5 期，頁 52。

79 金華地區文管會（貢昌），同註 60，頁 824-825。

80 陳衍麟，〈安徽繁昌出土六朝魂瓶〉，《東南文化》1991 年 2 期，頁 313 圖 1。

81 蔣纘初，〈關於宜興陶瓷發展史中的幾個問題〉，《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 65-66。

82 羅宗真，同註 63，圖版貳之 4。

83 羅振玉，同註 34，續編六，頁 2483；續編十三，頁 5312。

84 臺灣私人藏，筆者實見。

85 南京博物院（張勳），〈江蘇江寧縣張家山西晉墓〉，《考古》1985 年 10 期，頁 913。

86 李剛，〈漢晉胡俑發微〉，《東南文化》1991 年 3、4 期，頁 79。

岡內三真氏則認為其應與喪葬時鎮魂儀式有關的死靈憑依之處，同氏並將穀倉罐外觀區分為上中下三層，主張下層表地下世界，中層象徵現實人間社會或與此相近的地上世界；上層或是表現與天上相近的是世界，從而由上中下各世界構成一個完整的宇宙空間，而死者的靈魂則存在於此一中心。其次，長谷川道隆氏亦推測穀倉罐上部建築或為仙人所棲息之崑崙山宮殿樓閣的象徵，其反映了死者昇天的意圖。陳定榮氏從三十年代紹興出土的永安三年紀年穀倉罐上之「鹿」、「五種」刻銘，推測所謂的「五種」實指「五穀」，主張穀倉罐應是象徵儲藏五穀之處，為一特為亡靈設置的明器。⁸⁷此外，小南一郎氏亦主張穀倉罐與葬送儀禮密切相關，其上部的華麗建築為死後靈魂所棲息的樂土，下部壺身表大地，整體象徵著一個宇宙。至於其具體的功能則在於溝通今生與來世，即死者靈魂可經由穀倉罐到達祖靈的世界，欲招死者之魂時，亡魂亦可通過罐回到當今世界；而罐上所飾佛像可能是為祈求亡魂安息。⁸⁸就目前的資料看來，穀倉罐雖有可能兼具某種民俗祭儀功能，然而目前也只能就已知作品的裝飾題材內容或造型特徵進行間接的推測，未有定論，並且亦未針對做為六朝穀倉罐之前身的東漢時期五聯堆塑罐上的貼飾圖像之意義，進行較為全面而周詳的考察。事實上，早在三十年代，任職於浙江省圖書館的張拯元即曾依據造型和裝飾特徵，將紹興出土的穀倉罐區分為「神亭」和「五壺罇」。而「神亭」所飾亭臺是取「神所馮依之意」；「五壺罇」上所飾牌樓碑亭、人物鳥獸則是取「子孫繁衍六畜繁息之意，以妥死者之魂而慰生者之望」。⁸⁹儘管張氏並未列舉任何文獻或其他證據來支持這一論點，不過其「憑靈」的說法，至今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現藏上虞縣文管會之具有穀倉罐早期樣式的東吳青釉作品，以及與穀倉罐貼飾作風極為相近的被定名為西晉人物堆塑灯器等作品，⁹⁰前者貼飾的熊呈自瀆狀，後者裝飾的人物均裸身並且強烈地誇張了女陰和男根部分。私人藏品中也可見到於環繞大罐口沿的四只小罐罐下，各置一手握巨大生殖器的熊羆。眾所周知，熊經常被作為表現男根威武的象徵，近人俗語中猶將精液稱做「熊」，故熊或亦具有生殖的象徵。以熊作為裝飾題材的穀倉罐數量極多，並且有部分作品罐身穿鑿有孔，孔旁飾魚、鳥或泥鰱、虺蛇、蜥蜴之類的爬蟲類，有人認為蜥蜴紋樣也有象徵男根的涵義。⁹¹此外，《詩·小雅·斯干》載：「大人占之，維熊維虺，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也」。穀倉罐上的熊和罐身小孔旁所飾爬蟲（虺蛇？）是否確有生男育女的象徵意義？目前雖難遽下斷言，然若結合穀倉罐碑文所見「宜子孫、作吏高」或「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孫、壽命長，千意（億）萬歲未見英（央）」等刻銘，似乎可以推測穀倉罐可能還具有祈求子孫繁衍，六畜繁殖或穀物豐登的生殖功能。

87 陳定榮，〈論堆塑瓶〉，《中國古陶瓷研究》創刊號（1987），頁73。

88 小南一郎，〈壺型の宇宙〉，《東方學報》61（京都，1989），頁180-181。

89 張拯元，同註23，頁15。

90 朱伯謙，同註6，圖版43。

91 趙國華，〈生殖崇拜文化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282-283。

另一方面，有關所謂穀倉罐的名稱問題，迄今亦未取得一致的見解。雖然依據研究者的間接引述，聲稱過去江蘇吳縣曾發現刻有「造此廩」字樣的穀倉罐，⁹²從而出現穀倉罐應稱為「廩」的看法。⁹³然而由於該器未經正式報導，且數年來當地的研究者在論及穀倉罐時亦均未涉及此一發現，其可靠性恐怕值得懷疑。其次，同縣獅子山三號西晉墓所出穀倉罐碑文，有「用此□」刻銘，有研究者認為「用此」之下一字可能做「甕」，而「甕」亦做「甕」，瓦器也，主張穀倉罐於當時或稱「甕」。⁹⁴相對的，岡內三真氏則認為所謂的「甕」應為「喪葬」二字，表喪葬之意，同氏並主張將該類堆塑罐稱為「穀倉罐」並不正確，而應將之稱為「魂瓶」。筆者雖然同意「用此」之下銘文可能為「喪葬」之意，然而對於「魂瓶」的稱呼仍持保留的態度。實際上，穀倉罐的命名，往往還涉及研究者本身對於該類作品用途的推測，不過如果前述永安三年青瓷穀倉罐上確實刻有「五種」等字，⁹⁵則陳定榮氏所主張「五種」在此應專指《周禮·夏官·職方氏》所載「其穀宜五種」，鄭玄注：「五種，黍、稷、菽、麥、稻」即五穀之種的看法就有相當可信的依據。其次，在發掘江寧縣索墅磚瓦廠一號西晉太康元年（280年）墓時，穀倉罐上端的方欄和屋頂單獨與同墓共出的磨盤座和磨盤上扇置於一處，⁹⁶其擺設若屬有意為之，那麼做為穀物加工工具的磨和所謂的穀倉罐與穀倉的關係則頗耐人尋味。而福建霞浦吳天冊元年（277年）墓出土的穀倉罐內，據報告書記載還殘留有炭化的稻穀。⁹⁷此外，小南一郎氏也曾指出，從穀倉罐曾見有於罐身刻劃雲梯圖形的作品（指瑞昌馬頭墓所出作品，圖20），吾人縱使不能將穀倉罐上的建築直接視為倉庫，卻也不難想像其與倉庫觀念的交融結合；而穀物倉庫於中國不僅僅是穀物貯藏之地，同時還是穀靈和祖靈憑居之處。⁹⁸因此，儘管所謂的穀倉罐是喪葬用的明器，少數作品如南京鄧府山一號墓所出者於罐上方還裝飾有棺材及相對跪伏的孝子等題材（圖9），⁹⁹而做為其前身的東漢五聯堆塑罐的具體用途無疑也有待日後進一步的探討，不過在尚未能確認所謂穀倉罐的真正名稱之前，暫且稱其為穀倉罐似不為過。

小結

穀倉罐所見的裝飾內容，種類異常豐富。除了清楚易見的各式樓閣、亭、闕建築之外，另有各

92 黃遵編，《上海博物館藏瓷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圖10解說參見。

93 李知宴，〈三國、兩晉、南北朝製瓷業的成就〉，《文物》1979年2期，頁50。

94 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同註15，頁135，圖版拾陸之1。事實上，筆者頗懷疑上述「兩件」吳縣出土的帶銘作品，實為同件器物。

95 朱家潛編，《國寶》（香港：商務印書館，1983），頁160圖56之解說。

96 南京市博物館（周裕興），〈南京獅子山、江寧索墅西晉墓〉，《考古》1987年7期，頁618。

97 黃亦劍，同註22，頁116。

98 小南一郎，同註88，頁209-210。

99 華東文物工作隊（曾昭燏、尹煥章），〈四年來華東區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的發現〉，《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11期，圖32。

類飛禽走獸或人物、瑞獸、神仙以及佛像等等。它們多以模印貼花、捏塑的技法裝飾於穀倉罐上，少數作品則兼採用陰刻線畫繪製圖形。上述種種裝飾題材，提供我們理解當時建築、動物家畜、樂舞、雜伎、服飾、樂器或民俗宗教信仰等具體的參考資料。特別是穀倉罐上經常可見的佛像裝飾，更是探討中國南方早期佛像流布及其有關問題的極為重要的線索。

就筆者所知中外公私收藏的近一三〇件六朝穀倉罐，計有三分之一的作品都裝飾有佛像，佛像均有項光，著袈裟跏趺坐於蓮花座上，且一律為跏趺像，不見立像或半跏思維像。紀年時代早自東吳寶鼎四年（269年，圖4），晚迄西晉元康七年（297年）都可見到。¹⁰⁰若結合穀倉罐之外裝飾有佛像的其他三國兩晉時期陶瓷作品，則不難發現六朝陶瓷的佛像裝飾明顯集中於孫吳末期至西晉中期之間。其中紀年作品又以浙江嵊縣吳永安六年（263年）墓出土的青瓷奩時代最早；¹⁰¹最晚的目前屬江蘇揚州胥浦和江寧縣西晉元康七年（297年，圖10）墓出土的穀倉罐。就可確認出土地點的穀倉罐而言，除江蘇、浙江兩省之外，安徽、江西和福建亦有少量出土。不過飾佛穀倉罐目前只見於江蘇、浙江、和安徽等三省分，分佈於江蘇南京、太湖、鎮江、揚州；浙江紹興、寧波、溫州、金華、杭州；安徽蕪湖等各地區。結合穀倉罐以外飾有佛像的其他陶瓷的出土分佈，則可勾勒出當時飾佛陶瓷的大致流行範圍。即北自洪澤湖地區金湖或揚州胥浦，西至湖北宜昌，西南達湖南資興，東至浙江上虞、慈溪，東南達浙江溫州地區的平陽縣，其中又以南京地區、紹興地區、金華地區、太湖地區、鄂城地區、蕪湖地區較為密集（附圖一）。眾所周知，南京地區為六朝故都所在，是六朝政治、經濟中心；太湖地區既是高級士族周氏家族所在，又是豐富的魚米之鄉；紹興、金華地區則分別是著名的越窯和婺州窯的主要生產地之一；而湖北鄂城既為孫吳故都，也是當時漢譯《法句經》的所在地點。這樣看來，飾佛陶瓷的集中出土地區，既與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有重疊之處，也與佛教相對流行地區或窯窯生產地有一定關連。值得一提的是，就目前的資料而言，似乎不易看出其與近年來部分學者所大力提倡的早期佛教造像的「南傳系統」的傳佈路線有明顯的連繫。

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發現的吳、晉時期的佛像夔鳳鏡，其出土地點與飾佛陶瓷分布範圍有重疊之處（附圖一），而所謂的畫文帶佛獸鏡也都是三國時代的吳鏡或晉代在吳的故地所作之鏡。依據近年來的研究得知，吳鏡的鑄造中心主要在吳郡吳縣（蘇州市）、會稽郡山陰（紹興）和江夏郡武昌（鄂城）等三地，¹⁰²其不僅與飾佛陶瓷的集中出土地區有相近之處，紹興地區也正是飾佛陶瓷的產地之一，部分穀倉罐碑文所見「會稽」、「會稽上虞」等銘文，即說明了該類作品有一部份是來自越窯所生產。其次，1930年代布蘭克史東¹⁰³於紹興九巖窯址亦曾發現筆者推測可能是穀倉罐上部貼飾附件

100 有學者認為紹興西晉永嘉七年（313年，圖一九）墓所出穀倉罐亦裝飾有佛像，不過從發掘報告書所載圖版或文字內容，均無法確認該一說法，報告參見沈作霖，同註8，頁59圖2。

101 嵊縣文管會（張恆），同註4，圖版壹之4。

102 王仲殊，〈論吳晉時期的佛像夔鳳鏡——為紀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而作〉，《考古》1985年7期，頁636-643；王仲殊，〈吳縣、山陰和武昌——從銘文看三國時代吳的銅鏡產地〉，《考古》1985年11期，頁1025-1031。

103 A.D. Brankston, Yüeh of the "Nine Rocks" Kiln.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1938. Dec. Pl. II. E.

的青瓷坐佛，它們是長江中下游地區手工藝品特有的裝飾題材。此外，除了金華、南昌兩地的兩枚變形佛像夔鳳鏡分別為西晉和東晉時期作品，絕大多數的佛像夔鳳鏡均為吳中期至後期所鑄造。¹⁰⁴與此相對的，飾佛陶瓷則以西晉作品居多，比飾佛銅鏡的流行時間稍晚，並且目前還不見東晉時期飾佛陶瓷作品。其間的關係當然還有待今後進一步的探討來解決，不過裝飾有佛像的陶瓷之出土分布、生產地點、流行年代、裝飾手法和作品的可能用途，既是研究中國早期佛像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陶瓷斷代的輔助材料之一。

最後，綜觀吳、西晉陶瓷所見佛像裝飾，佛像經常與鳥、龜、鹿、羊、熊、爬蟲或鳳鳥、麟、羽人、仙人騎獸、雜伎樂人、鋪首啣環等屬雜並列，反映出當時佛像是結合在中國的傳統民俗之中。而從湖北鄂城出土的佛像夔鳳鏡之帶二重円光佛像，既結跏趺坐於蓮花座上，蓮花座兩側則又飾以經常見於西王母臺座的龍虎形獸首；長沙出土鏡的圖紋中也可以看到，在跏趺坐於蓮座上的主佛兩側，代替左右脇侍的是經常侍候東王公和西王母的「羽人」，說明了佛像是利用中國傳統神仙圖像的舊方式來表現的。¹⁰⁵其次，江蘇吳興西晉元康六年（296年）墓的飾佛青瓷雙繫罐，¹⁰⁶其佛像所在位置在同一時期相同器形的陶瓷器上一般都飾以鋪首啣環或異獸，從而得知，佛像在當時曾被作為一種辟邪或象徵吉祥的紋樣。此外，包括穀倉罐在內的陶瓷器上所見佛像，多數均非高高在上，而經常只是作為一種填塞空間的裝飾題材，部分穀倉罐上所飾佛像尺寸既小，裝飾部位也不明顯，並且往往被周圍其他裝飾所遮掩，不能輕易識別。湖北宜昌市出土的西晉青瓷博山爐，佛像甚至被當做撐托的器足，¹⁰⁷表明南方地區佛像雖已有了某一程度的流行，然而顯然還缺乏後世般的崇敬。將佛像飾於可能兼具祈保生人富貴多子，穀物豐收的明器穀倉罐，也顯示當時中國接受佛教已偏重其祈保福祿的現實利益。文獻記載，東漢明帝之弟楚王英並祀黃老（黃帝、老子）、浮屠（佛）；桓帝共祀浮屠、老子等事，也清楚地表明當時的人們是將佛教與祈求長生不老、崇尚無為的黃老信仰等同並置，反映出中國佛教的基本性格以及外來宗教為了在中國求得生存而不得不與中國固有的思想、民俗信仰相互調和的一個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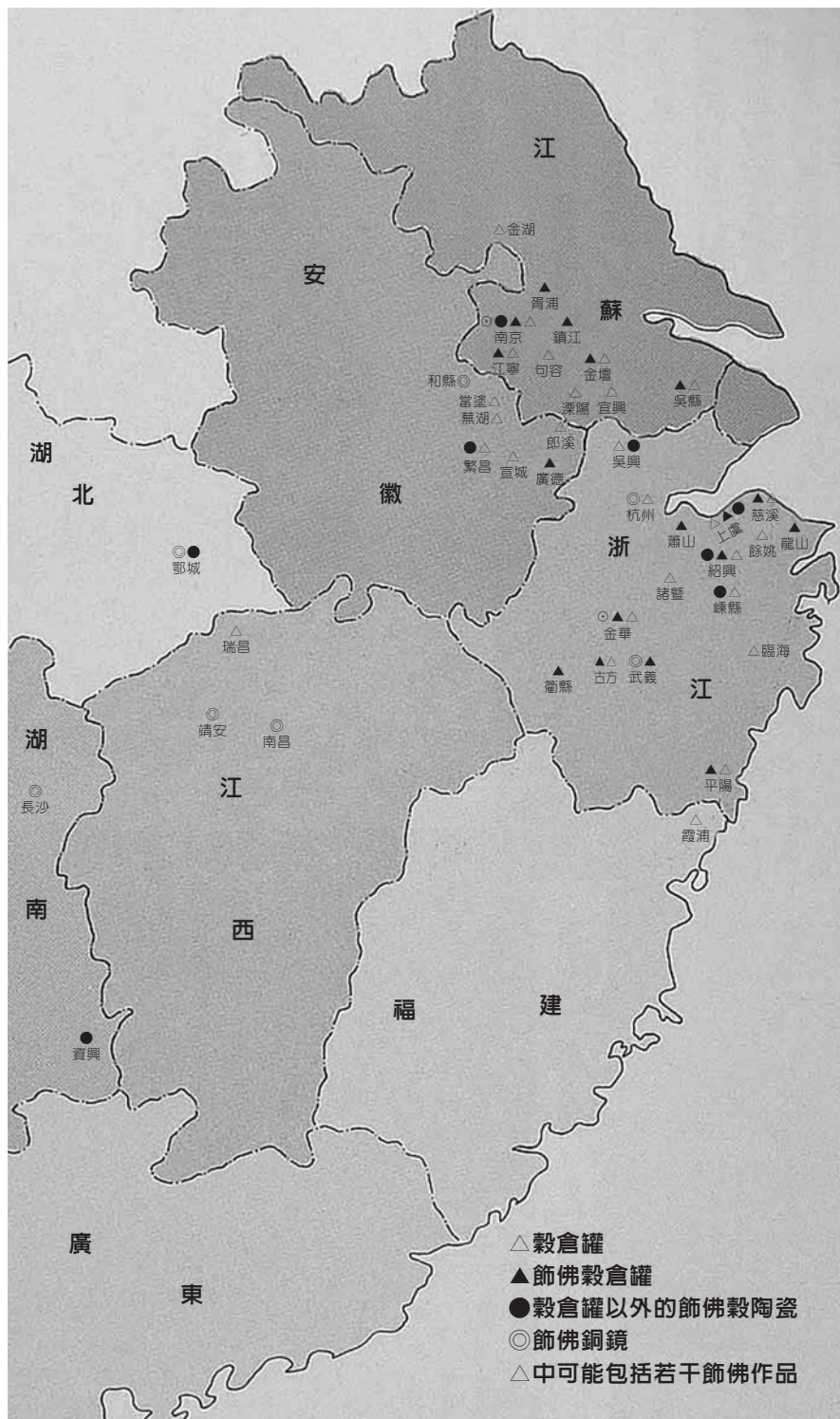
（原載《故宮文物月刊》10卷1期，1992年4月）

104 王仲殊，〈論日本出土的吳鏡〉，《考古》1989年2期，頁161。

105 王仲殊，同註102，頁641。

106 朱伯謙，同註6，圖35。

107 宜昌市文物處（周之梅），〈宜昌市六朝墓清理簡報〉，《江漢考古》1984年1期，頁39圖2之3。



附圖一 穀倉罐及飾佛陶瓷、銅鏡出土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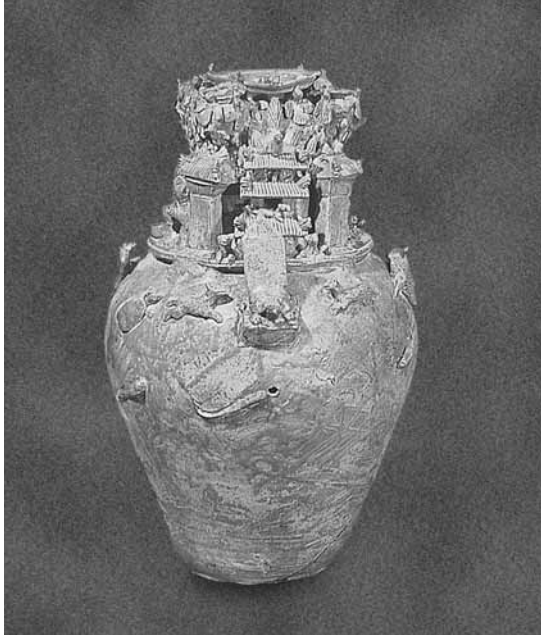


圖1 浙江紹興出土
吳永安三年（260）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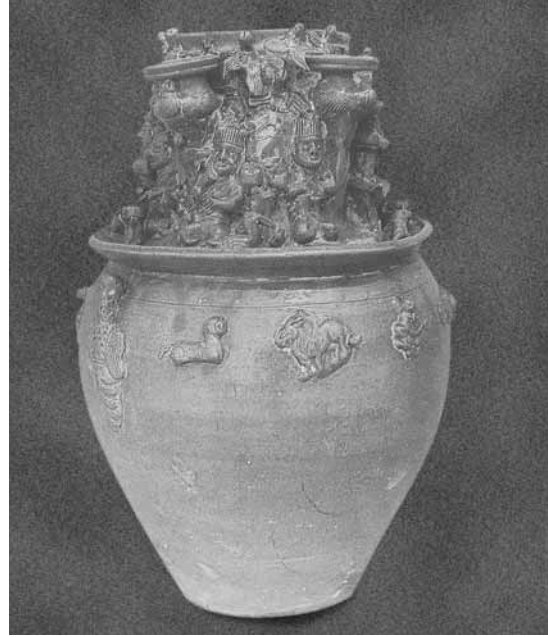


圖2 浙江蕭山東晉永昌元年（322）墓出土
東吳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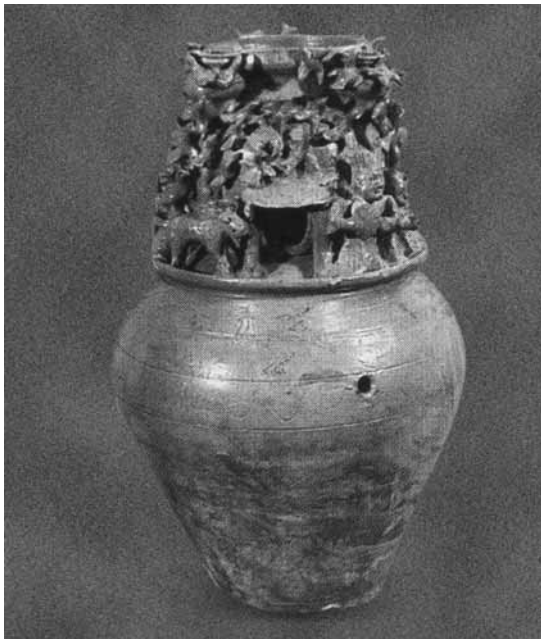


圖3 東吳青瓷穀倉罐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館藏



圖3b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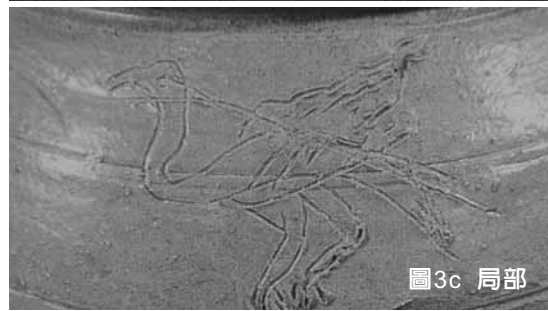


圖3c 局部



圖4a 吳寶鼎四年（269）銘青瓷穀倉罐
臺灣私人藏



圖4b 局部



圖4c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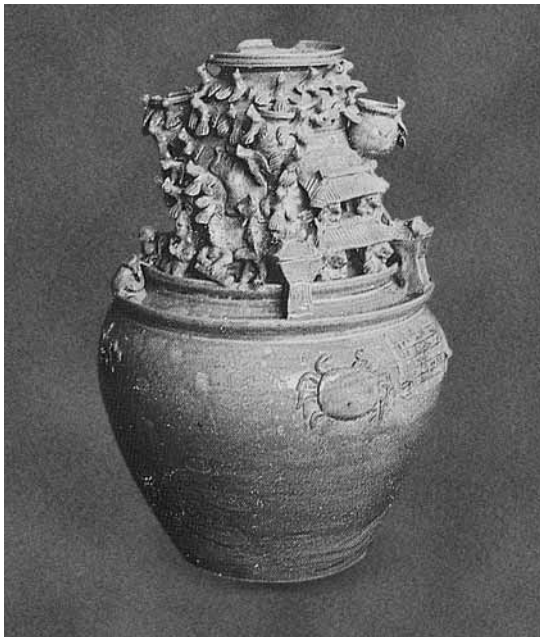


圖5 安徽宣州市博物館藏
東吳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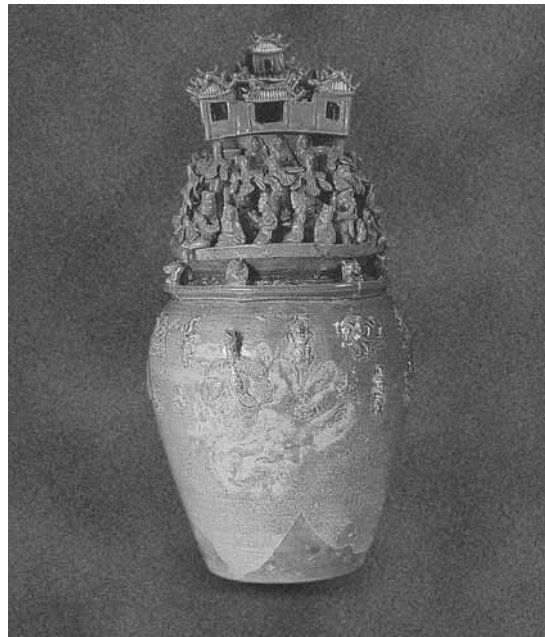


圖6 青瓷穀倉罐 西晉
臺灣私人藏



圖7 安徽繁昌吳墓出土



圖8 南京甘家巷高場1號墓出土
東吳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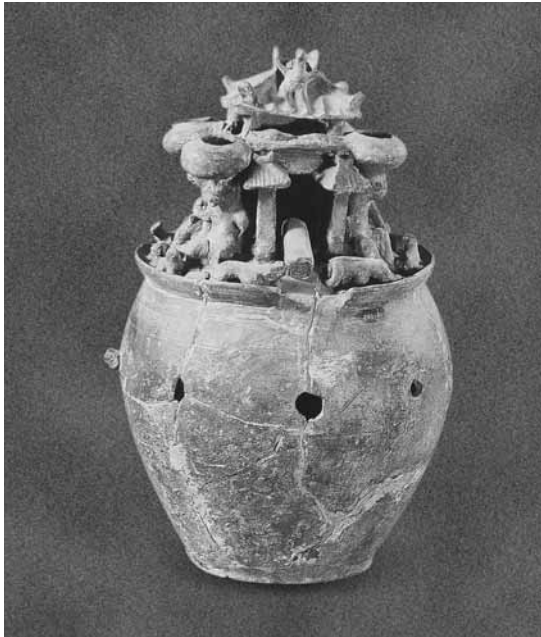


圖9 南京鄧府山一號墓出土
東吳時期



圖10 揚州胥浦西元康七年（297）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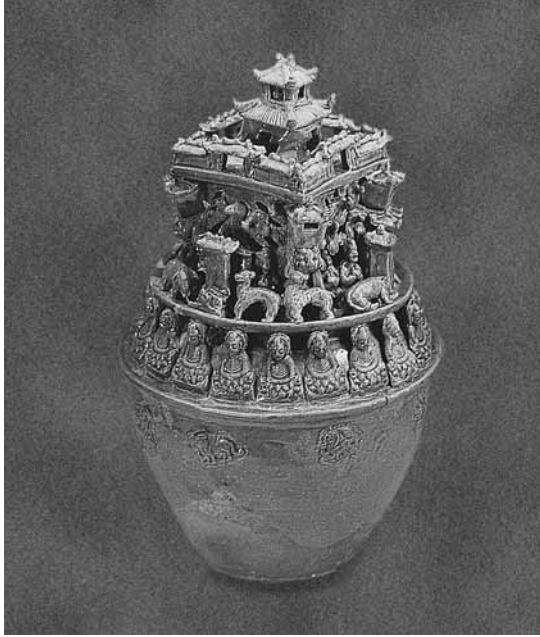


圖11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西晉時期



圖12 飾佛穀倉罐殘件
吳至西晉初 臺灣私人藏



圖13 浙江平陽縣出土
西晉元康元年（291）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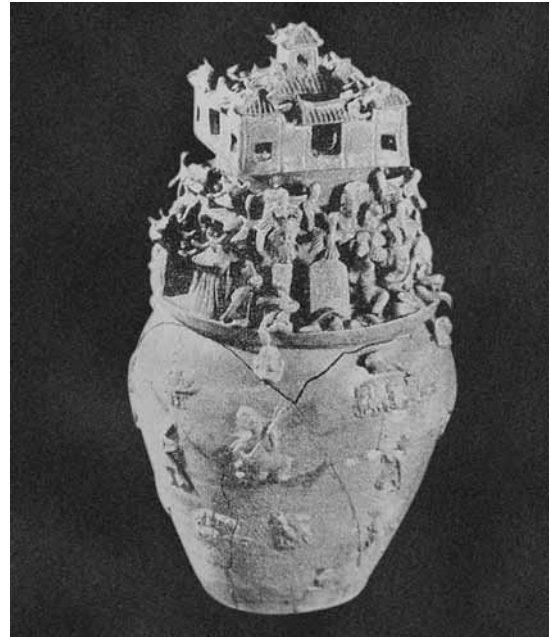


圖14 江蘇吳縣出土
西晉元康二年（292）銘



圖15 江蘇江寧吳天冊元年（275）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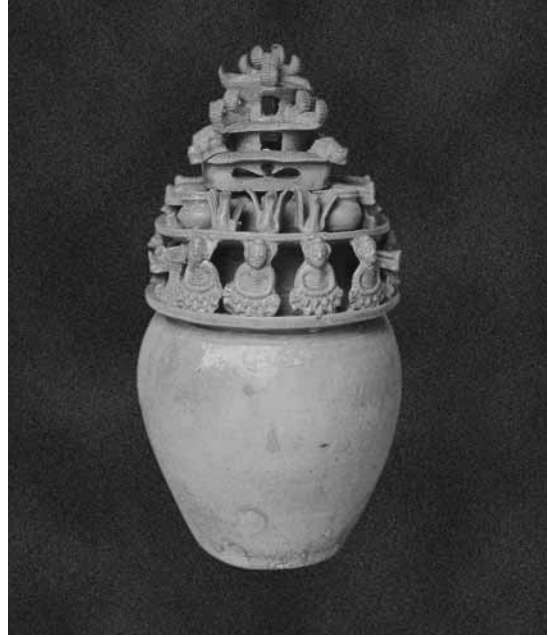


圖16 江蘇吳縣西晉元康五年（295）墓出土



圖17a 青瓷穀倉罐
吳至西晉



圖17b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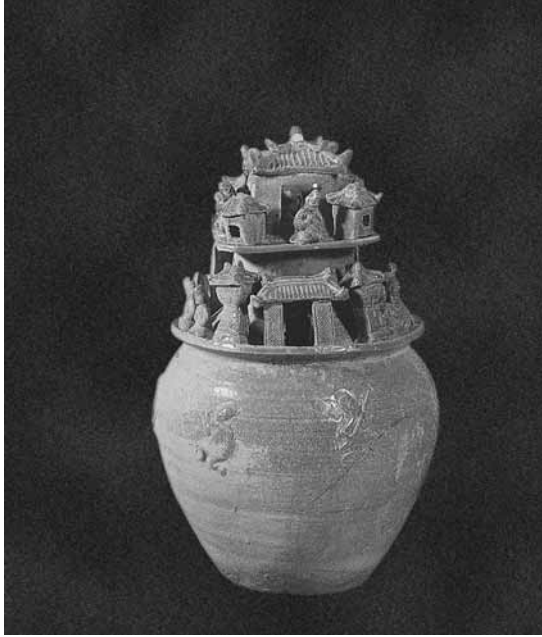


圖18a 浙江嵊縣西晉太康九年（288）墓出土



圖18b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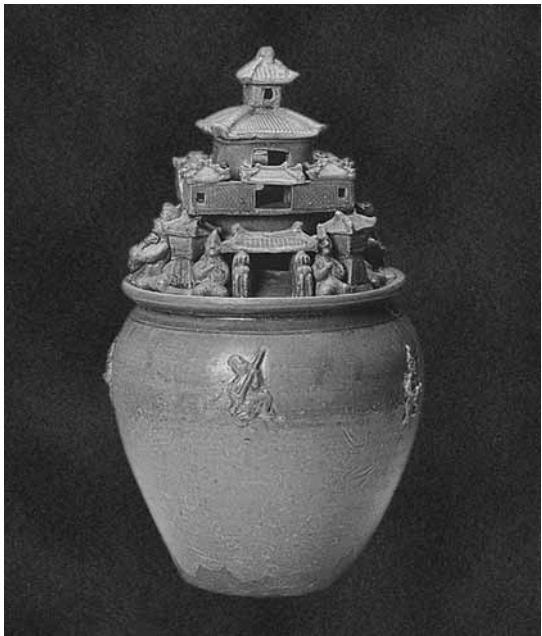


圖19 浙江紹興西晉永嘉七年（313）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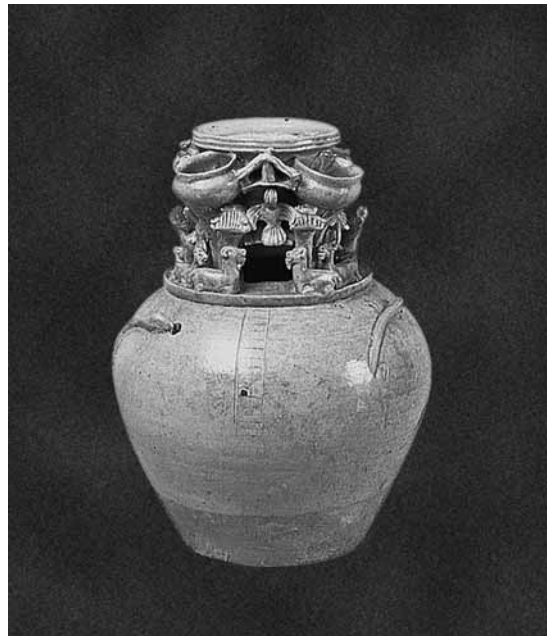


圖20 江西瑞昌馬頭西晉墓出土